

# 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2024年

■ 李君如

2024年以召开和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已经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如果再过5年、1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2024年,我相信,我们将会对今天所做的一切,认识更深,体会更多。因为,2024年是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元年。

## (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历史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尤其是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独特的相互关系,彰显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中国,大踏步跨入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新阶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概念内涵分析讲起。

在当今中国,“改革”是最响亮的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一届党中央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第10个三中全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到2035年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且提出了300多项改革举措。这里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因为10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要“继续”10年前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其“总目标”。

那么,10年前启动并在10后要进一步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改革”前加上修饰词“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意义之一,就是治理要围绕发展来推进;意义之二,就是治理的目标任务设定要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匹配;意义之三,就是治理要有利于发展、能够促进发展。这就是2024年启动的这一轮改革的时代特点。

化”和“全面”,这样的理解就太简单化了。关于“改革”,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时,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我们只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和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对照起来读,就可以知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改革”一般意义上的延续,而是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战略构想提出的,“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改革,强调的一是“全面”或“总

体”,二是“治理”。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又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改革,是以“治理”为目标的改革。这就是“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联系和区别。

那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10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在哪里呢?第一,两者的联系主要在改革的“总目标”上。10年前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年后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以“治理”为总目标的改革。第二,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主题”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也就是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内涵,一在继续推

进以“治理”为总目标的改革;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推进以“治理”为总目标的改革。

## (二)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联系历史来做一个更生动而又鲜明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组织起来”四个字把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改天换地,创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当我们都组织在一个个单位里时,如何激发大家活力的问题发生了。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时,用“活跃起来”四个字把中国人民的活力激发了出来,创造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奇迹。但在中国搞活的同时,各种乱象也发生了,邓小平提出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击犯罪,后来又提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邓小平的“两手抓”理念,从全面从严治党开始,提出一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时候,他明确

提出“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强调“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也就是说,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时,强调的是“活而有序”四个字。

10年后,我们要从“活而有序”阶段向“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新阶段迈进。希望大家注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次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也就是说,2024年的中国,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从“活而有序”推进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新阶段的起点。

## (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强调“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时候,引人注目地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显然,这一全新的论断不仅深化了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认识,而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尽管不能简单地说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括,但把这一问题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强调“三个相适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毫无疑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意义之一,就是治理要围绕发展来推进;意义之二,就是治理的目标任务设定要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匹配;意义之三,就是治理要有利于发展、能够促进发展。这就是2024年启动的这一轮改革的时代特点。

我们为什么说2024年以召开和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已经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就是因为无论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中国改革来说,还是从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推进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新阶段,都是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 思享

# 城市年轻力:让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

■ 薛泽林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生活形态,为文明进步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机会、促进了融合。就城市生命历程而言,如何保持自身活力,防止衰退,促进持续发展,确保城市在未来竞争中赢得先机,“城市年轻力”成了理解这一夙愿的新视角。从理论溯源看,年轻是一个多维概念,涵盖了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代表着活力热情、充满希望、无限可能。城市年轻力的新解读,可以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践提供创新思路以及话语支撑。

## 城市年轻力的多维度意涵

从产业视角来看,城市年轻力主要指产业的不断升级与迭代。如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理论认为,经济不同层次的发展可以划分成三大阶段、六个时期,每个阶段的发展又分为两个时期。在初期产业阶段,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在中期产业阶段,制造业部门对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大,同时第三产业规模也在壮大;在后期产业阶段,制造业的内部结构产生了变化,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代表,同时第三产业开始分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城市主导产业与同一区域、同一时间段的其他城市相比,具有阶段和时期上的优势,这是理解城市年轻力的文化视角。

从历史视角来看,城市年轻力主要指城市本身的兴衰更迭。从历史经验看,无论人类主观意志如何渴望城市不朽,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内外交互巨系统,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巨大,绝大多数城市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即便抛开公元前几千年人类最早的城市遗迹不言,众所周知的古罗马城如今也仅部分残存,盛极一时的汉、唐长安城也都都被付之一炬,社会富庶发达的宋代汴京如今也沉睡于开封地十数米。古城是历史厚重的积淀,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和皈依,但古城也在意味着当下与历史相比的衰落。重新解读城市年轻力,让古城焕发新生,让其重新充满蓬勃向上的力量,这是理解城市年轻力的历史视角。

从文化视角来看,城市年轻力主要指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精神品格。不同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承担着不同使命或面临不同的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实践以及由之而来的整个城市呈现出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就构成了文化层面的城市年轻力。近年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上海临港新片区,其发展也呈现出了面向未来、挑战最高的精神风貌,同样也是城市年轻力的充分体现。城市充满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力量,拥有不怕困难勇于挑战新高地的



视觉中国

精神气概,这是理解城市年轻力的文化视角。

从人口视角来看,城市年轻力指城市中青年人所占比重。城市青年人占比不仅反映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城市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从全国数据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青年快速城镇化。1982年,我国青年城镇化率为22.53%,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71.00%,显示了青年人口在城市中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上海为例,浦东是全市15—34岁年龄段青年人最多的区,2000年至2020年,浦东新增常住人口中超过1/4是青年人,其中在2000年至2010年浦东人口增长最快、增幅最大的10年间,新增常住人口中的青年人占到近43%。青年人通过劳动力就业等方式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这是理解城市年轻力的人口视角。

##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新内涵

关于城市年轻力内涵“产业、历史、文化、人口”等不同视角的解读,表明了其概念复杂性,也为从功能视角理解城市年轻力提供了新思路。从城市使命和功能来看,城市年轻力不仅是宏观层面的城市历史发展和产业跃升概念,也不仅是微观层面的城市精神品格和人口比重概念,而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维度。在这一维度下,基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年轻人是新生产力创新实

践的弄潮儿,是流量时代城市品牌力的代言人,是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力的风向标,是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成效的试金石”这些基本共识,城市年轻力指的是城市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年轻人,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政策设计主要面向的是年轻人,指的是城市面向未来发展的竞争优势与年轻人融为一体爆发力和耐久力。这也意味着,即便青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是最高,即便城市并非新兴城市,只要城市发展依靠青年,城市发展为了青年,城市拥有基于年轻人的总体竞争力,那么这座城市就是具备年轻力的城市。

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城市年轻力为解读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了新内涵,极大地拓展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实践空间。第一,城市年轻力代表着城市对青年可参与、可共享的包容性。其无关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城市精神品格的开放性和成长性,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是文化呈现的丰富性,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化。第二,城市年轻力代表着青年对自身全面发展的精神能量。年轻力是任何时候都能够推动不断向上、不断创新,以一种大无畏的态度面对生活的能量,是渗透在兴趣、情感和生活方式中的精神活力,是表达个性的果敢,是追求新潮的勇气,是探索未知的热情,聚合在城市里即表现为城市朝气蓬勃的进取力量。第三,城市年轻力代表着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与生命力。这意味着城市能够不断更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挑战,它

不仅具备吸引青年人的魅力,还能激发青年人的热情与创造力,使他们成为推动城市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城市中,青年人的梦想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共同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基于城市年轻力的新解读,结合“政策树”工具方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政策实践可以从以下维度展开。首先,在价值导向层面,基于城市年轻力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突破当下城市发展中过度的生产与消费导向,将年轻人的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发展需求作为城市发展的最底层逻辑。其次,在需求确定层面,围绕年轻人生存发展的需求大类至少包含了创新、婚恋、健康、就业等场景,这也是当下年轻人主要诉求,并构成了政策树的第一层关系。再次,在政策举措层面,围绕青年需求四大场景,政府分别形成相应的工作规划与实践,并在回应青年需求的基础上,为青年作为创新创造更大的空间,形成新的城市场景和业态,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最后,在融合发展层面,通过青年需求与政府政策供给的双向互动,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与年轻人融合在一起,并实现城市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年轻人,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政策设计主要面向的是年轻人,城市面向未来发展的竞争优势与年轻人融为一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 新语

# 完善基层治理平台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 吴涛

基层治理平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 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

加强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二是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党组织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三是进一步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当前,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存在诸如协同推进的合力需进一步提升、基层队伍的动力需进一步激发、数字赋能的效力需进一步增强等问题。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通过有效有序有力的基层治理,建设一个资源整合、功能集成、机制有效、群众参与的平台。要在基层治理中善于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从发现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破解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过大”或“过小”的现实困境,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挽上群众勤劳之手,带着一起干,使民生工作直达民心民意。要坚持“人民主导”的工作方法,在“生活圈”“服务圈”“工作圈”的搭建和完善中不断织密城市主体间链接网络,通过凝聚不同主体的认识达成城市共同体的思想共识,通过协调不同主体的行为形成治理合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领域全过程各环节,搭建“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框架架构;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注重“多方参与”,做到“制度管事、有人干事”,主动作为、创新作为、有效作为,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把基层治理平台打造成为完善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示范点;推动治理主体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 扩大群众有序参与

在具体实践中,要重点做到融入大局、嵌入程序、纳入制度,不断扩大群众有序参与。第一,推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下沉基层,着眼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民主协商,推动协商民主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么效果”转变,把提质增效贯穿协商民主的全过程各方面。第二,因地制宜地建立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着力引导好社区居民共同商议、共同管理、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多方共同解决社区难题的合力。第三,践行好群众路线,提升党员干部的民主能力,培养群众的民主素养。第四,发挥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优势,建立收集社情民意的平台载体,形成网上网下收集、分类、交办、反馈、督查的快速高效工作流程。第五,不断增强基层立法联系点“直通车”作用,使立法过程成为凝聚群众智慧、统一思想认识、传播法治理念的过程,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工作上来,体现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上来。第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内容,总结推广协商议事特色品牌,健全多元纠纷调解机制。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为上海市重点智库课题“完善上海基层治理平台建设的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